

# 《政治學》

一、政治學研究途徑可以分為傳統研究途徑、制度研究途徑、行為研究途徑、理性抉擇研究途徑、後行為研究途徑，以及新制度研究途徑，請說明各途徑發展背景。(25分)

試題評析	本題考的是對政治學發展的認識，屬於基本考古題，在各種國家考試中屢見不鮮。包括95年調查三等、96地特三等、97年普考、102身障三等、104身障三等、104原民三等、104年原民四等、105身障三等、106原民三等都出過類似的考題，因此對於按部就班準備的考生而言，這一題並不困難。得高分的關鍵在於，是否能在有限的時間中，完整表述出每種研究途徑的重點內涵，預估程度好的考生得分可能超過20分。
考點命中	1.《高點·高上政治學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蘇世岳編撰，頁15-17。 2.《政治學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蘇世岳編著，頁2-4~2-16。 3.《高點·高上107地方特考行政重點題神》政治學，蘇世岳編撰，頁4-2熱門議題4。

**答：**

自1880年政治學系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起，雖然沒有精確的年代劃分，但大多數政治學者都能同意，當代政治學的發展，大致上可以二次世界大戰為界，而以研究途徑的差異分成兩個時期：二戰前，政治學主要遵循傳統研究途徑以及制度研究途徑；二戰後，受到社會科學界行為主義(behavioralism)運動的影響，出現行為研究途徑。行為主義政治學在1970年代出現了小插曲，產生後行為研究途徑，而在經濟學與數學的影響下，同時期出現理性抉擇研究途徑。另外自1980年代起政治學者試圖融合行為主義與制度的研究，由此出現的即是新制度研究途徑。以下即分別論述以上六種不同研究途徑的發展背景。

- (一)傳統研究途徑：廿世紀以前，政治學的研究經常與哲學、歷史學與法學等混雜在一起，並受到中世紀神學與倫理學等影響。哲學途徑的研究是政治學研究者最早採取的研究途徑，它屬於描述性(descriptive)、規範性(normative)與應然面(what should be)的研究，強調道德、倫理和價值判斷，學者關注探討應該怎麼樣做，才能達到良善的政治秩序，例如：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(Plato)的《共和國》(Republic)一書，提出理想國度應由哲君(philosopher king)來治理即是代表；而歷史是過去政治學家最主要的資料來源之一，其研究方法也受到政治研究者的青睞，因而政治史、外交史、政治思想史等即成為該時期主要研究成果。
- (二)制度研究途徑：19世紀中葉起，受到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制憲的影響，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學研究者，開始轉向鑽研國家憲法的內涵、變遷、解釋，及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分析，他們假設這些書面的文字描述，等同於實際上的政治運作，這種側重於憲法(包括行政法，或稱公法public law)、正式制度(如國會等)、法理等的描述性研究，受到當時德國「國家學」(staatswissenschaft)的影響，研究範圍包括主權，政府各部門的結構、關係與權限等，可稱為「正式的法制研究途徑」(formal-legal analysis)或「制度研究途徑」(institutionalism)。制度研究途徑與傳統研究途徑相似的地方在於，同樣不主張嚴格區分事實(facts)與價值(value)，有些甚至認為客觀的現象並不存在，頂多只能達到相對主觀(inter-subjective)，因此主觀思維研究途徑成為主要探討方法。
- (三)行為研究途徑：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政治學者重新思索過去對制度過度專注的偏差，而將焦點轉向於研究，究竟真實的政治世界是如何運作，這就促成行為研究途徑的出現。受到行為主義影響的政治學，是以經驗性(empirical)分析、實然(what is)面做為研究重點的政治學。他們不再重視國家或憲法等正式制度，而是轉向研究人的實際政治行為，並擴及到非正式的制度(如政黨、利益團體等)，尤其是可以量化、進行統計研究的投票、選舉或立法行為等，成為最主要的研究課題。總體而言，行為主義政治學者的研究目標即是，要將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「政治科學」(political science)。
- (四)理性抉擇研究途徑：1970年代，理性抉擇研究途徑在數學家與經濟學家的鼓吹下快速發展，並被引進至政治學研究中。理性抉擇研究途徑的基本假設是，它將行為者視為是理性、自利的，他們都有偏好(preferences)，偏好間具有聯結性(connectivity)與遞移性(transitivity)，並且能夠加以排序，行為具有目的性(目標取向)，行為者會考量行為的成本(cost)與效益(utility)，並且會盡可能地將自己的利益極大化，最後產生一個最佳的行動。代表性學者如唐斯(Anthony Downs, 1930-)，他在《民主的經濟理論》(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, 1957)一書中結合經濟學的理论，試圖解釋民主社會中選民的投票行為，以及不同政黨在意識型態光譜上的分佈。

(五)後行為研究途徑：在1960年代以前，行為研究途徑取得了空前的勝利，但在1960年代末期卻遭受強烈的挑戰，領銜人物是擔任美國政治學會(APSA)會長的伊斯頓(David Easton)，他在1969年的會長就職演說中，率先提出「後行為(post-behavioral)運動」。後行為運動的背景是，當時的美國深陷反越戰的聲浪中，學生運動、女性運動、黑人民權運動、都市貧窮問題、生態危機問題，加上尼克森(Richard Nixon)總統水門醜聞案(Watergate scandal)等的影響，人們對於行為研究途徑，無法提出有效的對應方法，深感不滿與失望，因而促成政治學界的自覺、自省運動。採取後行為研究途徑的政治學者，重新將「國家」(或稱「制度」)帶回研究的視野中，並強調公共政策研究之重要性，發展出「政策科學」(policy science)。他們承認事實和價值是相結合的，在量化的研究方法外，也願意採用質化的方法，後行為研究途徑主張，政治學者應該走出學術的象牙塔主動關懷社會，並針對社會上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。同時，這一時期起政治哲學(政治思想)所關注的規範性議題，也再度受到政治學者的注意。

(六)新制度研究途徑：1984年政治學者馬赫(James March, 1928-)與奧森(Johan Olsen, 1939-)發表〈新制度主義：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〉(The New Institutionalism: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, 1984)一文，提出「新制度論」(或稱「新制度研究途徑」)該名詞。他們認為，制度是一個獨立的變數，有自己的生命，並且會制約政治行為，影響人的態度。新制度研究途徑試圖從動態觀點解釋政治現象，注重制度脈絡以及時間序列，不僅重視制度的結果，也強調制度制定的過程。新制度研究途徑從1980年代開始對政治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，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再度將「國家」放在政治學的中心，討論國家此一制度因素在政治運作中的重要性，亦即將「將國家帶回來」(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)。

在政治學的不同發展階段，存在研究途徑的差異。然而截至目前，政治學界尚未有統一的研究途徑出現。總體而言，二戰前的研究途徑在追求一個理想的政治體制，以及正確描述不同憲政體制下的制度設計；二戰後，受到科學運動的影響，不同的政治學研究途徑試圖科學地解釋人們外顯的政治行為，晚近研究者將行為研究結合制度研究，企望更周全地解釋人們的政治行為。不同的研究途徑受到不同學科的影響，這使得政治學的研究成為一門整合的科學。

二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裡，某些經濟成長快速的威權政體成功地轉型為民主政體，其原因為何？試說明之。(25分)

試題評析	民主化議題雖是政治學的基礎概念，但事實上出題的機率並不太高，98年普考以及104年高考三級是近十幾年中少數兩次題型最相似的出題。即使如此，絕大多數的考生在準備政治學時，絕對不會漏掉第三波民主化的議題。本題的題意並非單考第三波民主化，因此如果只是將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因寫一遍，將偏離題意，經濟成長與民主轉型的關係才是得分關鍵。預估程度好的考生，本題也有機會拿下20分以上的高分。
考點命中	1.《高點·高上政治學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蘇世岳編撰，頁93-95。 2.《政治學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蘇世岳編著，頁15-14~15-20、15-26~15-27。

答：

民主化(政治民主化)也稱為「民主轉型」，是政治發展中政體轉型的一種。一般而言，政治學界多將政體區別為民主、威權和極權政體，而從威權政體(或極權政體)轉型到民主政體，即是所謂的「民主化」。第三波民主化的現象，是由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杭廷頓(S. Huntington)所提出，他於1991年出版了《第三波》(The Third Wave, 1991)一書，描述廿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。杭廷頓分析指出，在近代世界史上，共出現了三波的民主化浪潮，杭廷頓分析第三波的成因之一，導源於1960年代全球經濟的大幅成長，而經濟成長快速的威權政體，為何能成功地轉型為民主政體，茲論述如下：

支持經濟發展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推測觀點是：經濟發展將會減少貧窮與階級衝突，並促成「中產階級」以及「市民社會」的出現。而「中產階級」以及「市民社會」這兩者都與自由政治的價值有關，特別是早期的民主國家，例如：英國、美國，都是在經濟到達一定程度後才走向民主，而第三波民主化中的發展型國家，例如：台灣、南韓也是同樣的狀況。簡單來說，經濟成長促成民主的出現，主要是因為發達的經濟能縮小社會的差距，同時賦予個人相對自主能力。

(一)縮小社會的差距

這是指構成群體的次級單元，無論是階級、利益團體或是宗教與社會單元，雖然存在各樣的差異，但差異須有其限度，且須能經由制度加以連結，由協商而取得共識，這樣的社會才可能出現民主，而一個發達的

經濟能有效縮減社會的差距，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：

- 1.階層化低：階層化高的社會往往不是民主政體，經濟的發展能促成階層化降低。
- 2.流動性高：經濟發展促進流動，流動性高的社會才能促成民主，這裡的流動性包括人的流動(例如：職業、身份地位等)以及觀念知識的流動(例如：開放性)。
- 3.富有多元性：經濟的發展能促成權力的分散。

## (二)個人經濟生活的相對自主能力

這是指群體中的成員，應有維持其本身經濟生活之某種能力，而不絕對受制於特定的權威。學者研究發現，過分貧困的社會實現民主比較困難，而現有的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一般均高於非民主國家。經濟條件對於民主產生影響的原因有三種解釋：

- 1.識字率：除非一個社會的經濟達到某種水準，其識字率不可能達一定標準，識字率過低的社會，大多數人民對政治不可能發生興趣，政治知識也可能相當貧乏，而且在生活逼迫的情況下，不易理性地看待或處理政治問題，容易受到反民主的野心家誘惑或煽動，去從事暴力的政治活動。
- 2.抗壓性：經濟情況過差的社會，政治不易穩定，緊急狀況時常出現，人民對民主的迂緩決策程序，可能失去耐心。
- 3.多元社會：經濟發展過低的社會，民間組織、利益團體都不夠發達，不足以構成各種社會力量互相制衡的多元社會。

但前述的看法並非是簡單的經濟決定論，以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，民主就會自然出現，或者經濟未到達一定程度，這個國家必然不會出現民主。經濟發展對於民主化的影響，在早期的研究(例如：李普塞在《政治人》一書中的觀點)中即持正面的肯定態度，近年來雖不否定兩者間的關係(人均GDP超過6000美元的國家，大都實行民主制度)，但推論上則較為保留。保留論者的觀點是，經濟發展不必然產生民主，也就是這種直接、單純的因果關係是不存在的，例如：中國在改革開放後，雖然獲得高度的經濟發展，但民主之路顯然還遙遙無期；反觀早期印度經濟並不發達，但印度仍舊有效地運行民主制度，而成為當代人口數最多的民主國家。即使如此，一般政治學者仍認為，經濟發展和妥適的財富分配，對民主化的程度和鞏固仍有顯著的影響。

## 三、我國的立法院採用「並立式兩票制」(Mixed-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)的選舉制度。試說明此一選舉制度的意義，並以臺灣為例，詳述此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。(25分)

試題評析	選舉制度是政治學的基礎題，特別是台灣立法委員的選制屬於混合制，在歷年的國家考試中頗受出題委員的青睞，包括95地特三等、96調查三等、96地特四等、97高考三級、98身障四等、101地特三等、101高考三級、103調查四等、103地特四等、104地特三等、105身障三等、105原民四等都出過類似的考題。其中101高考三級、103地特四等根本與本年的考題如出一轍。由於屬於基本考古題，得高分的關鍵在於完整的鋪述，預料程度好的考生應能獲得20分以上的高分。
考點命中	1.《高點·高上政治學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蘇世岳編撰，頁89-90。 2.《政治學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蘇世岳編著，頁14-12~14-14、14-23~14-25。

### 答：

選舉制度是一套引導選舉運作並產生當選者，以決定政治權力和責任歸屬的一系列規則。各國的選舉制度可說是五花八門，不同選舉制度的最大差異即在於，如何將選票的分佈，轉換成席次的分佈，在制度設計上，考慮的重點主要有二：(1)一個選區的當選名額是一席，或者是二席以上。當選名額一席者，稱為單一選區，二席以上者稱為複數選區；(2)當選者是否需要獲得該選區投票數過半數的選票，需要過半數者稱為絕對多數決，否則即稱為相對多數決，我國立法院所採用的選制是一種混合的制度，一般稱為「並立式兩票制」(Mixed-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)，不同的選舉制度所產生的政治效果不同，特別是對政黨體系的形成有所影響。以下即說明並立式兩票制的意義，並以台灣為例，詳述此制對政黨體系的影響。

並立式兩票制是一種混合制(mixed system)。混合制是指混合了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。採取混合制的主要國家包括日本、德國、紐西蘭、義大利、南韓、俄羅斯等國的國會議員選舉，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也特別偏好混合制，而台灣的立法委員也自2007年的第七屆選舉起改採用混合制，一般也稱為「單一選區兩票制」，所謂的兩票制是指一票投候選人，另一票投政黨。混合制在席次的換算上，一般可分為德國的聯立式與日本的並立式，台灣即屬於並立式的兩票制。台灣採行的並立制(separated two-vote system)，行使上與聯立制相同，但選民「真的」拿到兩張選票，一票選政黨，一票選候選人，與聯立制不同的地方在

於，並立制下的兩票要分別計算，沒有關聯。換句話說，個別政黨是以其在區域當中的席次數，加上比例代表部分的席次數，而為該政黨最後的席次總數。並立制並不強調各政黨在得票數與席次數間的比例性，因為分別計票互不影響，因此有學者稱為「重疊性」(superposition)席次。整理而言，並立式兩票制的特徵及優缺點，包括：

#### (一)特徵

- 1.有一定比例的席位，利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方式產生。
- 2.剩下的席位利用政黨名單(party list)比例代表制選任之。
- 3.選民可投兩票，一票投給選區中的一名候選人，另一票投給政黨。

#### (二)優點

- 1.具有綜合性質，可兼顧選區代表性和選舉公平性的需要，政黨名單可確保整個國會具有比例代表性的效果。
- 2.從實務選舉的結果來看，雖然本制具有廣泛的比例性，但仍可維持單一政黨政府存活的可能性。
- 3.允許選民從一個政黨選擇一位選區代表，但支持另一政黨組成政府。
- 4.考慮到選民代表和擔任內閣職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工作，兩者需要非常不同的才能和經驗，混合制可同時提供這兩種人才。

#### (三)缺點

- 1.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的存在，阻止了高度比例代表性的達成。
- 2.本制度產生兩類代議士：一類背負不安定性與選區義務；另一類擁有較高地位，以及擔任部會首長職務的機會，雙方的地位和代價並不均等。
- 3.由於選區規模之故(一般只有小選舉區的兩倍大)，有損選區的代表性。
- 4.在該制度下，政黨變得更加集權，也更有權力。政黨不僅可以決定誰能進入安全名單，以及誰必須在選區裡面奮戰，而且可以決定候選人放在名單中的哪一位置上。

另一方面，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，最著名的就是杜佛杰法則(Duverger's Law，或稱杜瓦杰法則)。杜佛杰法則是指：(1)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有助於促成兩黨體系；(2)比例代表制與絕對多數兩輪投票制有助於多黨體系的產生與維持。選制對政黨體系的影響，來自於「機制效果」(mechanical effect)和「心理效果」(psychological effect)。

(一)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，在機制效果上會產生對小黨的「超額損失代表」(under representation)，席次率會比得票率低，對大黨則會有席次紅利(seat bonus)，形成「超額代表」(over representation)，因此在心理效果上，選民會採取「策略性投票」(strategic voting)，這是指如果第一偏好的候選人顯然無法當選，為了避免廢票，他會選擇次佳或最不討厭的候選人，以避免最討厭的候選人當選，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「棄保」，進行棄保，容易形成兩黨體系，且有助於防止舊政黨分裂與新政黨出現的可能。

(二)比例代表制，由於機制和心理效果上都沒有阻礙小黨的生存，因此是終結朝向兩黨體系發展的「有力煞車器」(a powerful brake)。它並不鼓勵政黨進行合併，即使政黨分裂成多個派系，也不影響其總席次，因而選民可以依照偏好投票，雖然比例代表制不一定會增加政黨的數目(如果有通常是舊政黨的分裂，且為小黨)，即使有也是有限的，通常是維持實施比例代表制之前已存在的政黨體系架構，但在一個社會分歧大的國家(或稱為「複式社會」)，很可能會形成極端的多黨體系。

至於台灣所採行混合制的並立式兩票制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，一般認為其所產生的影響，應該介於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與比例代表制之間。換言之，當混合制中的比例代表制比例越高時，對小黨的生存較為有利，但如果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成分比例較高時，則對大黨較為有利；而不同的計票規則也有差異，德國式的聯立制較強調比例性，而台灣採取的並立式兩票制在113席中僅有34席由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舉產生，有助於促進一個單一多數黨的出現。

選舉是「雙向的路徑」(two-way street)。它一方面提供政府與人民、菁英與群眾間相互影響的機會，是一種「由下而上」(bottom-up)選民對於政治人物、政策的課責；另一方面，選舉也有「由上而下」(top-down)的作用，它可以協助建立政權的正當性與實行政治控制。有選舉不代表即為民主，但選舉卻是民主的必要條件，在民主國家，選舉經常是人民控制政府的正式手段，也是人民最常行使的政治參與方式。但不同的選舉制度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效果，也會引導人民投票行為的改變，如何區辨不同選制的優劣，設計適合的選制，即成為20世紀末新興民主國家重視的議題。

四、請從參與者、議題領域、組織功能與運作模式等三個面向，分析冷戰後的安全性國際組織的發展趨勢、課題及挑戰。(25分)

試題評析	本題應該是本年度地特考試的鑑識題，類似的考題在過去十年的國家考試中並未出現過，這對於許多考生而言將是最具難度的一題。近來政治學的出題方向，國際關係領域的題目有逐漸浮現的趨勢，地方特考中也已經出現考題。解題的關鍵在於將題目依照題意的三個面向重新詮釋，比較冷戰前後的差異。本題如能拿下15分左右的成績，即屬於高分。
考點命中	1.《高點·高上政治學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蘇世岳編撰，頁100-102。 2.《政治學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蘇世岳編著，頁16-4~16-7、16-18~16-19、16-33~16-34。 3.《高點·高上107地方特考行政重點題神》政治學，蘇世岳編撰，頁4-3熱門議題6。

答：

權力關係不僅存在於國家之內，也發生於國家之間。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與互動即構成國際政治，國際政治有合作也有衝突，這源自於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本質，而國家利益則構成了各主權國家行為的驅動力。二次大戰以來，國際政治的主軸主要是分屬東、西兩大陣營，各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大集團間的冷戰(cold war)，這種冷戰情勢直到1989年終於落幕，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。在冷戰對抗時期，為了避免二戰的惡夢重演，國際社會中出現許多安全性國際組織，例如：聯合國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(北約)等，但冷戰結束後這些安全性國際組織也面臨轉型，以下即從參與者、議題領域、組織功能與運作模式等三個面向，分析冷戰後安全性國際組織的發展趨勢、課題及挑戰。

國際組織(有時也稱為國際政府間組織，IGO)是一個包含三個或更多成員國家，並且有正式運作流程的機構。國際組織的特徵是，透過法規來規範成員國之間的關係，同時藉由正式的架構來執行與或落實這些法規。一般來說，我們依照功能的差異，可以將國際組織大略分為經濟性國際組織與安全性國際組織。冷戰後，安全性國際組織出現以下面向的變化：

- (一)參與者面向：參與者面向可再細分為數量、成員數與成員性質等。在數量上，冷戰後安全性國際組織的數量持續減少，這主要與蘇聯陣營所屬組織的瓦解有關，但某些安全性國際組織下所屬的單位機構數量卻有增加的趨勢，連帶使得這些國際組織不斷成長；在成員數上，某些安全性國際組織逐漸減少，甚至消逝，例如：華沙公約組織，有些則成員數增加，例如：北約；而在成員性質上，意識形態偏左的安全性國際組織減少，偏右的則持續存在。冷戰的結束，參與者間所面臨最重要的課題不再是意識形態間的對抗，取而代之是如何共同發展成為主軸，但成員間的歧異性，包括發展程度的落差，卻成為嚴峻的挑戰。
- (二)議題領域面向：冷戰後，隨著國家間對於深化互賴的認識，使得安全性國際組織所關注的議題不再局限於權力政治，從而延伸至對經濟危機、人權侵害、發展落差以及環境剝蝕等相關議題的重視，由此拓展出經濟安全、人類安全、生態安全等新型態的議題領域。關注議題的增加，使得安全性國際組織所需處理的課題更加複雜化以及多元化，但也使得成員間如何達成多方間都能接受的共識成為新的挑戰。
- (三)組織功能與運作模式面向：冷戰結束，伴隨的是全球化的來臨，在全球化的政治中，權力在世界政治中，已不單透過主權國家，而是逐漸由不同的非國家行為者所行使，這些非國家的行為者包括多國籍企業、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，甚至恐怖組織等。這種權力本質上的變化，可從三方面觀察，首先，由於全球通訊中的新科技以及識字率和教育水準的提升，柔性權力(soft power)在政治結果的影響上，已經和剛性權力(hard power)同樣重要。柔性權力是由國際關係學者奈伊(Joseph Nye, 1937-)所提出，其認為所謂的剛性權力是指，國際行為者透過威脅或利誘等手段，影響他者的能力；而柔性權力則是指，透過說服等手段，勸誘其他行為者同意遵循某些規範與期望，因此其所仰賴的基礎是吸引力而非強制力；其次，新科技在許多方面，已改變了社會內部以及社會之間的權力平衡，壯大了傳統上不具權力者的權力，例如：國際恐怖組織；最後，全球輿論與政府行為，也都受到幾乎無所不在的電視，與廣泛使用的衛星科技所影響。簡言之，在組織功能上出現全球公民社會的挑戰，而在運作面向上，也存在全球治理的困難。

從冷戰到後冷戰，安全性國際組織面臨組織與功能重整的挑戰。尤其是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究竟會如何變化，也深深影響著安全性國際組織的發展，雖有學者認為，取代兩極對立而出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，但也有學者對此並不表贊同，而主張單極體系只是一個過渡的現象，未來世界的政治秩序，將朝向多極體系(multipolarity)發展。尤其是中國的崛起，許多人預言，廿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，這種強大的權力基礎除了龐大的人口外，還來自於快速的經濟成長，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，2010年甚至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加以龐大的軍事支出，以及中國近年在各大國際組織中所嶄露的全球性角色。容易被人忽略的則

是中國所展現的「軟實力」，這包括儒家思想在提供亞洲地區文化基礎相互合作的重要性，和中國反帝國主義遺緒在非洲與大多數南半球國家所擁有的吸引力。這將使得中美關係在廿一世紀中期，達成某種新的平衡，因而重新界定全球政治的情勢，也將使得安全性國際組織的發展不免受到中美兩大霸權競爭的衝擊。

# 高點 · 高上

【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】